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革新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了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总产量和人口的快速的增加以及生产效率的增长率”等六个方面。综上所述，无论是斯密的《国富论》、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还是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和资本形成》，实际上都是更加注重从供给研究财富的生产、流动、分配规律^[3]。

经济学流派的供给与需求之争论，为新供给经济学的演进奠定了理论基础。供给的经济学定义是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而新供给则是能够维持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场的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或管理模式。^[4]新供给经济学是由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对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进化，建立在传统理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信息及行为经济学等理论框架基础上，是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一定条件下，供给可以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供给将不能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甚至完全不能创造需求。^[5]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实现高效可持续增长，必须与需求侧管理协调运用，改革内生变量是要素新供给，外生变量是制度新供给、结构新供给、政策新供给，均要实现效率较大化，改革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因此，不能沿用仅侧重“需求侧”讨论宏观经济调控管理的传统框架，而特别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通过对供给端发力服务经济全局发展。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是新供给经济学的概念衍生与特定领域应用。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为“大市场，小政府”，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等要素的作用，并通过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优结构等手段，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加强优质供给，保证供给产品能够更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发展。^{[7][8]}高等教育

供给侧是教育政策、制度、资源、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其主体直接涵盖各级政府和各类高校。^[9]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则是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控规模、提质量、优配置、强效益、去产能、消库存等措施，进而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丰富高等教育供给结构，提高高等教育供给质量、效率和效益，最终形成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切适未来社会需求的资源优质、环境宽松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新供给侧结构。

（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价值意蕴：供给侧改革对地方高等教育功能的适应性解读

由省市属高校构成的地方高等教育，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后发性”、“特色性”、“应用型”和“亲产业”等价值属性，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各级各类人才输送、行业企业科研支撑和城乡社会服务的重要功能。^[10]而地方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整体有序而局部无序”的复合体系建构，结构是功能发挥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外部表现。所谓“整体有序”是地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均要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而进行渐进式的供给侧调整与变革。所谓“局部无序”则是地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的进化逻辑，需要依照自身的功能属性和发展规律，来进行“调结构、提质量、促平衡”等重点领域突破与主要矛盾解决。

首先，地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结构逻辑，应明确主次突出、优先发展与后发促进的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路线，更加突出地方高校在经济社会调结构、促转型中的应用型人力资源“引领”和“支撑”作用，形成多元化、高质量、内外部协调发展的地方高等教育“研-本-专”应用型人才培养供给链，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质性问题，使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结构、质量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更新升级和企业实际需求相适应、相匹配。其次，地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供给侧改革的质量逻辑，应突出地方高校科研成果立足本地、贴近市场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聚焦原则，主动面向地方典型产业集群、主体城市经济圈和优势特色产业带等实体经济振兴，及行业企业核心科技、关键技术的创新与竞争需求，破解制约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